臺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
2011 年 12 月，頁 227-234

BIBLID1012-8514(2011)48p.227-234
2011.2.21 收稿，2011.5.18 通過刊登

§書評§

評介陳進金著，《機變巧詐——兩湖事變前後軍系互動的分析》

臺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07，310 頁。

蘇　聖　雄*

近年來中國現代政治、軍事史研究，隨著檔案的開放，可操作之課題愈來愈多，中國大陸甚至興起民國史研究的熱潮，相關著作如雨後春筍般，大量出現。尤其庋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（Hoover Institution, Stanford University）的《蔣中正日記》開放閱覽後，相關研究更是與日俱增。過去臺灣具得天獨厚之史料優勢，中國現代史研究即使非獨步全球，也稱重鎮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甚至一度有「南港學派」之稱。然揆諸今日臺灣史學風氣，中國現代政治、軍事史之研究已非往昔可比，相關優勢雖非明日黃花，亦已面臨強大的挑戰。本書作者陳進金先生在此背景下完成此書，其成果若何？吾人或可審視。

陳進金先生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，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。曾服務於國史館十餘年，熟諳館藏《閻錫山檔案》（現稱《閻錫山史料》，以下簡稱《閻檔》）、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（現稱《蔣中正總統文物》，以下簡稱《蔣檔》），以之撰寫博士論文（後修訂為專書）、期刊論文等，[1]其研究之紮實與突破，為學界所重視。陳先生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；E-mail: d99123001@ntu.edu.tw。

1 陳進金先生博士論文修改後出版之專書：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2）。期刊論文則有〈勞燕不分飛：烽火下的蔣、宋情〉，《近代中國》第 158、159 期（2004，臺北），頁 178-187；〈蔣介石對中英新約的態度（1942-1943）〉，《東華人文學報》第 7 期（2005，花蓮），頁 123-150；〈「兩湖事變」中蔣介石態度之探討〉，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長年關注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關係，在其著作中，處處可見對這個課題的省思。而其省思並非空中樓閣，乃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，尤其在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一書中，他掌握中央（《蔣檔》）與地方（《閻檔》）的檔案，對此專題做出紮實、持平且具開創性的貢獻。本書承襲過去的研究取向，仍以《蔣檔》、《閻檔》為基礎，針對「中原大戰」（1930）前的「兩湖事變」（1928-1929），以民國時期軍系間的互動為核心，進行深入的考究與忖量，故也可視為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一書之「前傳」。

本書分為六章十二節，除去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，第二至五章依序以「機、變、巧、詐」四個字作為標題，以其內涵貫穿全書，突顯主軸。第一章「緒論」，述明此書之問題意識、重要性、論述方向，並進行文獻回顧、章節佈建與史料概說。第二章「機：南北統一的乍現」，包括第一節「國民革命軍北伐與東北易幟」、第二節「政治分會與地方實力派軍人」、第三節「國軍編遣會議的召開」。敘述國民革命軍北伐及至東北易幟之經緯，而北伐完成以後，中國終獲從紛亂走向統一（中央集權）的契「機」。但各地政治分會與地方勢力結合，使得中央仍難以掌控全局。於是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議決撤廢政治分會，收回行政權；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復召開國軍編遣會議，收回軍事權、財政權，創造中央化另一個新契「機」。第三章「變：兩湖事變的爆發」，包括「桂系勢力的擴張」、「『削藩』與『撤魯擁何』」、「李濟深被扣事件」等小節。首先敘述桂系的來源、擴張，再論述桂系對蔣中正之中央集權舉動極不信任，以致激起兩湖事「變」，最後嘗試處理李濟深何以被扣之歷史疑案。第四章「巧：桂系與南京中央的因應」，敘及「桂系軍人和戰不一」、「南京中央剿撫並進」、「蔣中正的謀略」。指出桂系軍人並非鐵板一塊，和南京中央相似，諸將領立場亦和戰不一。而中央、桂系雙方對事變的爆發，各有「巧」妙的因應，其中蔣中正的謀略最值得一提。第五章「詐：地方軍人的態度」，含括「馮玉祥的擁蔣與反蔣」、「閻錫

《國史館學術集刊》第 8 期（2006，臺北），頁 45-7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山、張學良支持中央」、「其他地方軍人的抉擇」等主題。分析馮玉祥、閻錫山、張學良等地方重要軍事領袖，和其他地方軍人對此戰事之爾虞我「詐」；中央爭取到大多數軍系的支持，預判了此一戰事的勝負。第六章「結論」，精要敘述前幾章之重點，檢討「中央集權」與「地方分權」之紛爭，並提出省思。

本書分析架構環環相扣，作者層層加強論述，使讀者易於了解全書之要旨。第一章緒論對全書做綜觀介紹，敘述背景，第二章便以全章節對事變背景進行更深入的剖析。第三章第二節敘述兩湖事變爆發，第三節即深入討論使桂系和中央無轉圜餘地之李濟深被扣押事件。第四章第二節探討中央剿撫並進，第三節則進一步討論蔣中正（主導中央）的謀略，歸納出蔣採取四項策略，其中兩項為拉攏其他地方實力派軍人、穩住何鍵、陳銘樞、陳濟棠等湘粵軍；第五章乃以整章放大這兩個主題，探討地方軍人的態度。末章結論復將全書要旨再做綜論，與首章緒論及其他各章節相互呼應。如此安排，足見本書問題意識、論述脈絡之明晰，對與地方軍系相關的課題，都有廣而深的闡述。讀完此書，可令吾人對兩湖事變兼有縱向時間（事變發生前因後果）與橫向空間（各地方軍系之互動）之廣泛認識。

本書在史料運用上，十分值得一提。過去學界對兩湖事變的研究，相當倚賴回憶資料，如《李宗仁回憶錄》、《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》，以及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的數篇文章。如是無原始檔案作為佐證，難以對相關課題做出更為具體的分析。本書則大量運用《蔣檔》和《閻檔》，突破過去的史料限制，讀者得以見到當時各軍系運作的「內幕」。尤其《閻檔》中的「各方往來文電」，為山西省電務處截錄當時軍政人士之往來函電。能於此見到者，不僅與閻錫山相關，亦收有全國各要人之文電，因此揭露許多政壇不為人知的運作，史料價值極高。如關於桂系首要李宗仁對兩湖事變之態度，研究者過去受限於史料，以為李在事發之初的確有意調解。作者依據《閻檔》，發現李一直暗中掌控兩湖軍事（頁115），實無和平解決之誠意，為桂系內部之主戰派（頁 159），作者並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戳破李回憶錄之自吹自擂（頁 124-127）。又如，過去以為桂系要角白崇禧「主戰最力」，作者爬梳史料，發現白的態度不宜以主戰、主和概括，應為「謀定而後動」派（頁 140-141）。而桂系另一領導人黃紹竑，晚年回憶自己在事變中之態度為老成持重，不欲急與蔣中正開戰；作者依據檔案，確定黃絕非主和，而是欲「親赴指揮，共同殺敵」（頁 153-154）。對於蔣中正的態度，本書亦有不同以往的發現。過去或認為蔣從頭至尾便意欲以武力解決，與桂系談判只為爭取時間，作者考據史料，說明蔣在事變之初的確不願輕啟戰端，欲以政治方法處理此變局（頁 174-177）。本書對《蔣檔》的運用，亦甚重要。第二章敘述北伐以至編遣會議之歷史，當中論述的課題，專書、論文等研究成果所在多有。作者能以《蔣檔》補充過去的研究，令此一章節不僅因襲、整理前人說法，亦甚難得。如第二章第一節以一定篇幅敘述的「五三慘案」，便以《蔣檔．事略稿本》對此一事件做了相當的補充。

掌握了質量俱優的史料，不代表就能完成學術價值高的著作，還需要組織分析能力的配合。陳先生在史料分析上展現的功力，使本書價值提升至更高的層次。特別在處理蔣中正為何扣押李濟深的歷史懸案時，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李濟深雖為粵軍出身，但被目為桂系要角，在兩湖事變之初，力主和平解決，乃不顧李宗仁的勸阻，入京調停，卻被蔣中正扣押。《李宗仁回憶錄》稱李濟深所以被扣，是因為蔣中正「無人格可言」，進一步認定扣李為蔣之預謀。作者透過分析李濟深抵京至被扣這 10 天之局勢演變，指出蔣並非預謀。蔣扣李的原因為「密通桂軍」（頁 132），以及「桂系將領不聽勸止，步步進逼」、「北方領袖態度一致，擁護中央」、「中央運用粵軍部隊，牽制廣西」（頁 133-138）等。經此分析，李濟深被扣事件獲得更細緻地處理，歷史懸案亦獲解答。而在論述馮玉祥對兩湖事變的態度時，作者則頗有見地的指出馮並無助蔣之意，僅欲坐觀鷸蚌相爭，收漁翁之利，最後卻因戰事迅即結束，錯失與桂系一同扳倒蔣中正之良機（頁 220-221）。此外，於書中我們只要看到「事實上」、「實際上」等詞語，便代表作者將開始發前人所未發，或訂正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過去之說法，讀之頗令人信服。例如，1928 年桂系高喊「鄂人治鄂」，以示大公無私，本書爬梳史料，指出「『事實上』……早在西征前，桂系領導人李宗仁、白崇禧就『已經』決定湖北省主席的人事」（頁 106-107），揭發了相關人士之政治宣傳。又如，白崇禧晚年曾以「阿拉真主」名義發誓（白為回教徒），他事前不知兩湖之異動；本書謂「『事實上』，不論白崇禧是否事前預聞湘變，其對南京中央的戰略部署，與反抗中央之心，早於前一年底則已有之」（頁 141），並以堅實的史料做了精闢論證，讀之頗令人耳目一新。

本書各項優點甚多，具體內容無法一一介紹，讀者若詳加閱讀，必有相當收穫。在此，筆者謹提出四點建議。

第一，本書序言、緒論和結論謂本研究希冀了解中國「中央／地方」爭論的本質，並指出以武力方式達到的武力統合，不僅耗損國力，也難達到真正的國家統一，反易招致外患入侵，使中國領土和主權迭遭列強侵略。故本書乃提供後人面臨類似問題時的「參考」、「省思」，以發揮歷史鑑戒功用，免蹈前人覆轍（頁 III、13、278-279）。本書目的如此，令人不得不思考作者對「現今」的「鑑戒」究竟為何？若將作者的「中國」對應現今之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則本書是否欲倡議和平處理中共對新疆、西藏，甚至臺灣等周邊區域之問題？循此脈絡延伸至臺海關係，文中既然強調「中央」與「地方」之關係，是否即肯定「一個中國」？若今日兩岸局勢為作者希望吾人「省思」之處，那麼，作者所謂「中央」、「地方」就現今而言所指為何，也值得吾人「省思」。又，對於作者欲提供的「參考」，筆者見方案之一的聯省自治「對於政權的統合，並無裨益」（頁 49）；另一方案——分治合作，「與國民黨訓政的目標相違背」（頁 52）；最後一方案——聯邦制，則未予深論（頁 279-280）。那麼，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，若有「地方」政權挑戰「中央」，不聽「中央」號令，甚至兵戎相向、爭取獨立，「中央」除了動武，還有甚麼妥適處理辦法呢？作者若能於日後的相關研究，對具體辦法再做闡發，當可令讀者豁然意解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第二，此書之作，目的之一在探討中央與地方之關係，但作者逕將蔣中正視作中央，是否能完全呈現當時的複雜情勢，筆者存疑。蔣雖為國民政府主席，但其強勢作為，使得許多地方軍系認為面對的是「蔣系」而非「中央」，是故兩湖事變及後續戰事有「蔣桂戰爭」之稱，乃至於中原大戰期間，有另立中央之舉。且在兩湖事變中，代表中央抵滬與李宗仁、李濟深調處的蔡元培、李煜瀛、吳敬恆、張敬江四位黨國元老，力保二李赴京之人身安全，但後來李濟深竟然在京被扣。雖然蔣中正扣李有其理由，但何嘗經過「中央」之同意？蔣扣李之舉，使得「代表中央」的四老難以自解，可知蔣之意見凌駕「中央」。或者我們可以說，以蔣角度視之，他本人就是「中央」。這樣的「中央」，某種程度上正好坐實反蔣派的指控——蔣把持中央、獨裁專制。從此脈絡觀之，兩湖事變不是中央、地方之衝突，而為國家內兩個主要軍系之內戰。筆者並非意指當時的「中央」不具意義，而欲說明當國家從兵馬倥傯初步進入一統安靖之際，「中央」涵義有其複雜之處，吾人或可再做思量。

第三，作者對地方軍系內部的論證，十分深刻，大量運用檔案、回憶錄，呈現各軍系之算計；但對於蔣中正、閻錫山之分析，卻稍有不足。如作者引用蔣中正的講稿，便論證蔣實施國軍編遣，是鑑於兵額過多以致軍費過鉅，造成民生凋敝、社會紛亂、國勢日蹙（頁 5）。考量當時錯綜複雜之政治情勢，此一公開之講稿，恐難以完整說明身處政治漩渦中之蔣氏的算計。又如，作者引用閻錫山致馮玉祥之〈養電〉，謂能「充分理解閻氏的態度」（頁 239），但筆者觀此電文，通篇所述為國為民，難以相信此為老謀深算之閻氏真意。事實上，此電出自《閻檔》「提綱」，為其秘書在多年之後所編寫，文脈以尊崇閻錫山是尚，故以此論證閻之真意，恐有困難。[2]

第四，排版、格式上或有可修訂之處，如第一次稱人或事，宜用正式稱呼或全稱；[3]正文腳註標號位置在標點符號之前或之後，宜全書統

2 本書頁 241 論述閻錫山之考量，便較為充分，可補〈養電〉之不足。

3 如孫中山可作孫文、蔣百里可稱蔣方震（頁 4、88）。緒論第一次談到「國民黨三全大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一；[4]段落開始應空兩格，全書行距應統一；[5]腳註若為英文書目，標點符號後應空半形格；[6]正文字型（全形、半形），應予一致；[7]引用書目格式也應統一。[8]另有錯字、[9]漏字、[10]贅文、[11]誤植、[12]標點錯誤之處，[13]再

會」（頁 7），宜稱「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」。頁 20 第一次提及「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」，宜稱「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」（同頁 46）。

4 如頁 8 第 9 行、頁 34 第 4 行、頁 35 第 2 段第 4 行、頁 87 最後 1 行、頁 149 第 5 行等處，註號在標點符號之前，其他在後。

5 頁 32 倒數第 3 行，空了 4 格。頁 172，引文行距與其他不同。

6 如頁 47 註 84、85，頁 48 註 86，頁 100 註 52，頁 207 註 2、3。

7 如頁 43、62、64、70、146、224、228、238 半形「……」應統一為「……」。頁 80 第 4 行唐繼堯的生卒年，字型與他處不同。

8 本書腳註引用文章，格式為：作者，〈篇名〉。頁 128、129 之註腳，有些卻變為作者：〈篇名〉，宜加改正。頁 137 註 129 引用雷嘯岑，《三十年動亂中國》一書，應加「上冊」。頁 273 註 1 引用書目出版地「『台』北」應統一用「『臺』北」。頁 287-288，徵引書目第三大項之日記、年譜、文集類中的《國父全集》重複列舉。

9 如頁 79 註 8 第 4 行，「成『積』」應作「成『績』」。頁 179 註 92 第 4 行，「第十『醫』師師長」，「醫」當作「一」。頁 190 第 2 段第 5 行，「各種途『經』的努力」，應作「各種途『徑』的努力」。頁 208，陳「宦」為陳「宧」之誤。頁 234 註 76 第 2 行，「奉、『閻』的同盟之議」，應作「奉、『閻』」。頁 251 第 3 行，拉「龍」應作拉「攏」。頁 259 第 1 行，劉文煇為劉文輝之誤。

10 頁 45 第 2 段第 3 行，「中央政府」漏「政」字。頁 58 腳註 113 第六點，「上海錢業公會」缺「錢」字。頁 78 腳註 4，齊錫生的書 *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, 1916-1928*，1928 年漏 8。頁 80 腳註 9 第 2 行，「速成學堂」漏「速」。頁 151 引文上面 3 行「會中通過解決湘變辦法後」，漏「法」。頁 170 最後一行「中央政治會議決議」，「會議」之「議」闕漏。頁 227 註 58 第 2 行，韓復榘缺「榘」字。頁 230 註 65 第一行引文，「擬懇」後面缺一個字。

11 頁 124 註 101 第 3 行「與廣州要員商量議」，「量」為贅字。頁 150 倒數第 6 行「其他皆接給資予以遣散」，「接」為贅字。頁 185 倒數第 3 行，俞作柏生卒年（1887-19549）應作（1887-1959）。頁 188 第 2 段第 6 行，「桂系卻在這場戰役中卻失敗了」，第二個「卻」為贅字。

12 頁 85 倒數第 6 行，「程潛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」，應為第六軍。頁 120 第 1 行，「軍事委員會常『任』委員」，應作「軍事委員會常『務』委員」。頁 137 之引文第 3 行，「李德鄰」為「李澤霖」之誤。頁 187 引用《蔣檔．事略稿本》，第 2 行「軍事領袖人也沒有不以服從中央相號召了」，原文作「軍事領袖，也沒有不以服從中央相號召了」。頁 237 中間「馮玉祥的『第三集團軍』」，為第二集團軍之誤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版時宜加修訂。[14]此外，在行文方面，本書後面幾個章節，句子有與前面完全重複者，[15]雖有加深讀者印象之效，但或可變換詞句、論述角度，豐富全書內容。

綜而言之，本書運用檔案紮實、豐富，輔以深刻的論析，對兩湖事變做了完整的鋪陳，日後討論相關課題，恐不得不引用此書。觀此書之作，或可知臺灣的中國現代政治、軍事史研究仍保有一定水準，值得推薦。惜此書印量甚少，流通不廣，若能加以推廣，不啻對學界之一大貢獻。

（責任編輯：蘇婉婷　校對：劉昱妤）

13 頁 103 第 5 行多一頓號。頁 145 之引文「兩湖省政府若照現在組織政分會，似不要亦可」，應作「兩湖省政府若照現在組織，政分會似不要亦可」。頁 155 第 6 行「胡宗鐸、等人曾分別致電李宗仁」，頓號宜刪。

14 其他或可修改之處，頁 162 提到「馮玉祥駐北平代表何克之」，此何克之便是北平市長何其巇（頁 223 有提及），克之為其字，書末索引可將二者合併（頁 304）。同頁提及「一位署名『挺修』者」，為李宗仁之總參議溫挺修，參見胡適著，曹伯言整理，《胡適日記全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4），第 5 冊，民國 17 年 4 月 28 日，頁 80。亦可將之補入索引。

15 如頁 166 倒數 3 行至 167 第 1 行，與頁 113 倒數 7 至 4 行完全重複。頁 168 第 6 行至頁 169 第 3 行的句子，與頁 117 重複。頁 247 的註 108 同頁 33 之註 46。頁 254-255 依序重複頁 120、136、197、198 之內容。頁 272-275 則相似句子不斷重複。頁 278 之文字幾與頁 228-229 完全相同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